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著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05

25.000元

I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著 II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 III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 IV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
抗日根据地 原民主管理 原研究 IV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000 号

论延安的民主模式

——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

敬本 罗燕明 叶道猛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北路 251 号 邮编 710062 电话 029-8537600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mm×1168mm 32 开本 16.5 印张 368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25.00 元

序摇摇言^{*}

华安德

我很高兴今天参加这次会议,我 1949 年代初来过西安,总觉得西安是我的故乡,我能到西安来参加会议,感到特别高兴。刚才荣教授、罗教授介绍了课题成果,我很受启发。荣教授翻译了我的文章,我的文章是 1949 年写的,不知现在是否还有用处。中国古话说:古为今用。我也从中学点历史,一方面可以懂得目前社会的情况,一方面可以吸取一些教训,以便把握将来发展的方向。目前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都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治理方式、政府的治理结构同样面临着许多挑战。如果参考延安时期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其实,我看延安时期也是一个转轨时期,长征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到延安来了。虽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是党的最高领导,但是党内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共产党今后的发展方向还不是很清楚的。比如张国焘,他就有另外的一些观点。苏联的留学派,他们从苏联归来,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毛泽东至少没有到共产主义的苏联去学习,毛泽东的实践和经验,他们都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支持共产国际的看法。因此,在长征以后,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延安时期正好是一种转轨的过渡时期。

* 这是华安德教授在西北大学举行的关于延安的民主模式研讨会上作的讲话,经本人同意,现把这篇讲话作为本书的序言发表。

在 1942 年这一过渡时期,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就是刚才荣教授所说的话语体系。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形成中有许多共产党的领导都参加了,同时,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很重要。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就有利益方面的合作,不过国民党提供的财政物资的援助不多,因此对于共产党脱离封闭的、孤立的发展轨迹的帮助不大。第二个方面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分散的游击战争中,需要有统一的思想 and 意志,但是,具体作战的形式和做法,还必须依靠每一个解放区当地的领导。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一方面必须有统一的思想,另一方面必须让党内的人自己做具体工作,处理各种关系。怎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看这也是延安模式的重要背景。中国历来有一个条条块块的问题,条条是从上而下的思想体系,块块则是各地有自己灵活的余地,如何把这两者连接在一起,这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只有通过一个共同话语体系,才可以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困难。延安地区特别贫困,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农民的经济是自然经济,还有合作经济。党的经济是计划经济,是一个政府机构的经济模式。我想,这三个因素形成的政治体系,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对政治体系的发展、话语体系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在我们讨论延安的政治体系时,可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党内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毛泽东的对手王明的思想,等等。因此,在 1942 年,搞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统一思想,一个是建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力。第二个是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原则,只是一

种群众参与式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如何同人民民主、民主主义原则相结合,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第三个是大生产运动,在今天来看大生产运动还是为计划经济提供了一个实践经验的基础。第四个是发展富农经济问题。发展富农经济,鼓励吴满有这样的富农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合伙和合作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大问题。我看,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包括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内的,新民主主义是延安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发展的成果。

大概是在 1945 年 1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一直到 1956 年,好像他对新民主主义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思路,新民主主义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里面包括实行统一战线的想法,参与式的政府治理,混合经济,等等。但是,为什么 1956 年以后,毛泽东很快就不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了,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看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些因素。一个因素是苏联模式,毛泽东到莫斯科去了以后,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学习苏联的模式。第二个因素是强调社会主义高潮、高速发展,企图用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三个因素是毛泽东对社会不同成分的估计,对反共威胁的估计,因此,在 1950 年代初期,毛泽东从延安模式转到斯大林式的模式上来了。

现在中国改革也有许多新的内容,包括发展党内的民主和人民的民主制度,发展社区民主建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重温延安模式,重新考虑延安的经验,重新研究新民主主义后来的变化,根据当时和现在的情况,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和采用,你们的这种研究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是很有意义的。

目摇摇录

序摇言 华安德 辑

第 员章
导摇言 辑

第 圆章
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模式的比较 辑
 圆源摇民主主义的话语模式 辑
 圆源摇共产主义的话语模式 辑
 圆源摇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模式 辑
 圆源摇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话语模式的比较 辑

第 猿章
中国国民党从三民主义走向封建法西斯主义 辑
 猿源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话语模式的由来 辑
 猿源摇蒋介石从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 辑
 猿源摇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实行全面的法西斯
 统制政策 辑
 猿源摇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带有封建帮派的性质 辑
 猿源摇蒋介石推行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辑

第 源章
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 辑
 源源摇转变的时机 辑
 源源摇这种转变的哲学基础 辑

源缘新民主主义话语模式的核心是把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缘愿

第 缘章

共产国际的话语模式

缘袁

缘缘共产国际的权威来自它的话语模式

缘袁

缘缘共产国际的话语模式的形成

缘愿

缘缘共产国际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话语

缘缘

缘缘缘世界革命论

缘缘

缘缘缘不平衡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论

缘园

缘缘缘革命高潮论

缘原

第 远章

王明的话语模式

缘苑

远缘“国际路线”

远苑

远缘“抗日高于一切”

远远

远缘缘王明对战略转变的贡献

远远

远缘缘王明的新话语

缘愿

远缘缘王明新话语的作用

缘园

远缘缘王明的新话语经不起实际的考验

缘远

第 苑章

毛泽东的话语模式

缘恩

苑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缘恩

苑缘新的话语模式

缘园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论——三种价值观的结合	卷
第五章 “三大法宝”颠覆了王明的话语结构	卷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成败论英雄	卷
第七章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党的路线史观	卷

第八章

话语模式的转变——延安整风运动	卷
一 主流话语的束缚	卷
二 话语模式转变的突破口——“学习”	卷
三 走向整风——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卷
四 新话语和新程序	卷
五 整风运动	卷
六 整风运动的契机	卷
七 程序变动的意义分析	卷
八 整风文献——文本中的话语	卷
九 政策类	卷
十 党书类	卷
十一 思想方法类	卷
十二 结论类	卷
九 组织体制——话语的机构	卷
十 调查研究机构	卷
十一 学习机构	卷

第九章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道德的中国化	卷
----------------------------	---

怨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产生的背景	轶页
怨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道德话语	轶怨
怨摇《论党内斗争》——规范党内话语的方式	轶怨
怨摇听话的义务与说话的权利	轶园

第 园章

如何保障话语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轶缘
园摇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轶缘
园摇保障话语权方面的教训	轶源
园摇剥夺话语权	轶愿
园摇整风的悖论	轶园

第 园章

康生制造的话语禁律	轶缘
园摇早年历史	轶缘
园摇禁律升级	轶苑
园摇话语可变,禁律长存	轶苑
园摇党外与党内	轶园
园摇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	轶源
园摇审干与反奸并举	轶源
园摇抢救失足者	轶园
园摇“正确”的决策与错误的执行	轶缘
园摇话语的被利用	轶猿
园摇被利用的话语	轶愿
园摇话语模式和话语禁律	轶怨

第 四 章

党的民主集中制

202

第一节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历史考察

202

第二节 话语模式在民主集中制中的重要作用

205

第三节 保障话语权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核心

209

第四节 话语模式和体制

213

第 五 章

人民民主制度

216

第一节 实行三三制

216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

220

第三节 加强党的领导,反对以党治国

224

第 六 章

延安的混合经济模式

228

第一节 主张公私兼顾

228

第二节 让农民富起来,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232

第三节 注意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来调控经济,发展对外经济交流

236

第 七 章

延安的文化模式

240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

240

第二节 延安的文化繁荣

244

第三节 民主和大众的关系

248

第 1 章

延安民主模式的现实意义

绪论

后记

附录

第 1 章 导摇言

摇摇延安是我国革命圣地 ,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正是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我们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 ,简称为延安的民主模式。

延安的民主模式是成功的 ,这已经被大量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所证明。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引下 ,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延安民主模式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延安民主模式的胜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也许考虑到同前苏联的关系 ,往往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继续 ,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以后在反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通常所说,“真理夸大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当然,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应该从前苏联的解体中去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应当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去否定延安的民主模式,否定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延安的民主模式在我们当前改革开放的时代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为什么说重新认识延安的民主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呢?

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前苏联解体后,前苏联推行“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当时,在美国形成一种所谓“华盛顿共识”,即凡是原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制度和体制破坏得愈彻底愈好,只有这样,市场化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但是,前苏联在“大爆炸式”的改革以后生产力发生了大倒退,政治不稳定,民族矛盾加深,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这种所谓“华盛顿共识”破产了。相反,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政治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邹说^①教授注意到了延安的民主模式不仅对我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的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邹说教授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

(员)这里并不存在“必然规律”,这就是说,既不存在社会主义

^① 邹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邹鲁,他本人在西南联大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在华之失败》、《文化大革命和毛后的改革》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邹说教授在 1985 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曾经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全能主义政治与中国》一文曾经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 1985 年发表,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关注。1993 年逝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曾发表了他的学生曹景钧先生的悼念文章。

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必然代替社会主义的规律,这里的关键是共产党本身的行动。这就是说,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行动,不仅可以使革命取得成功,而且也可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延安的民主模式提供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行动的成功实例。

(圆)“今天社会科学的发展已告诉我们,人类可以利用已经寻找到的局部性因果关系,去改变社会和社会制度,并且可以改变过去被认为由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所支配而无法控制的行为。”^①邹谠得出这一结论的实例又是延安的民主模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延安地处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陕北地区,而中国国民党则处在经济和文化相对先进的地区。因此,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或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期,改变社会似乎必须依靠中国国民党,这似乎是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所支配而无法控制的行为。但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利用已经寻找到的局部性因果关系,却改变了这种似乎无法控制的行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社会制度,这又一次证明了延安民主模式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和农村开始的,我们也是利用已经寻找到的局部性的因果关系,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

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比较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理念(泽莱荆尚蒙蒙蒙)的自我维持系统”^②,这里的“理念”既有对未来的信仰、预期的意思,又有对现实的观点、思维方式的意思。在人们的重复博弈过程中,会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共同的信任,以致成为某种契约,这种共同的信任和

① 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

② 见荣敬本:《比较经济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契约的自我维系,就会演变成制度。把制度看成是共有理念形成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批判了那种“华盛顿共识”的制度形成观,这两种制度观是针锋相对的;前者强调制度变迁是内生的,后者强调制度变迁是外生的,靠外力推动或靠人为设计的;前者强调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离不开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而后者则强调制度变迁是某种技术的产物,可以靠技术专家或技术官僚来实施;前者强调制度变迁要靠制度中各种关系的相互支持,要依赖共有理念的转变,而后者则强调制度变迁依靠政府推行某种法令;前者强调制度变迁靠信息诱致人们共有理念的变化,而后者则强调制度变迁可以靠仿效某种外国模式取得成功;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前者强调政府和民间取得某种共识,而后者则认为,既然制度是由政治决定的,其隐含的推断是改革是否能进展,都拿政治家是问,使政府和民间处于对立的地位。

当前中国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否取得胜利,还要决定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延安的民主模式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员)延安的民主模式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对延安民主模式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共有理念。

(圆)延安的民主模式具有路径依赖性质,它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优良传统,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延安的民主模式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有助于建立共有的理念。

(猿)延安的民主模式具有内部协调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支持的系统,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参照系。

(源)延安的民主模式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信息。中国的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它可以诱发人们去思考、比较和创新。延安的民主模式是中国的创造，是可以发扬光大的。

（缘）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延安的民主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阶层人民共同创造的，借鉴延安的民主模式，将有助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相结合的新的体制。

我们研究延安的民主模式，虽然可以参照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但是，并不能完全照搬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是以经济体制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延安的民主政治，必须借鉴研究哲学、政治、文化以及政党的研究方法。托尼·赛奇先生在研究延安模式时曾经把毛泽东思想称做一种“话语、话语体系或话语模式”（把共产党比做话语的共同体。在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似乎是一种贬称，但多阅读一些西方政治、文化的著作，就会发现“话语”是一个常用词，而没有任何贬义。例如，英国的大卫·休谟是同亚当·斯密并列的苏格兰哲学家、政治学家，也是最早研究政党政治的著名学者，他的论文就被称为“话语”。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请教已故邹说教授，看看他对“话语”一词的解释：

“我二十多年以前就提出一个断论：‘毛泽东思想是从过去的实际行动和决策中发展而来的。’它主要是行动与政策之根据的阐述，为行动与政策提供正当的理由或自圆其说的解释。毛泽东的贡献不在理论和学说的领域，而是在革命过程中作出不少有决定性的选择，使中共转败为胜。毛泽东自己似乎了解到创造纯理论学说不同于阐述政策与行动的著作，他不用毛泽东主义而采用毛泽东思想一词来代表他的贡献。我在二十年前，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的提法，与近年美国社会学界研究各国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结论是一致的。乌服闹（砸穿）教授在研究欧洲宗教改

革,启蒙时期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结论是:‘社会运动的论述(话语)与它本身的活动,又与它的更有概括性的理论发展,互相影响: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结构的静止的反映,也不是强加于现实的知识框架;它是这个社会运动的行动中可以修正的组成部分,它是行动的结果’。‘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的结果;是共产党人的集体对政策的选择,和选择政策时的思想,由毛泽东综合而成的产物。”^①

按照邹说教授的解释,“话语”这个词的含意有以下几点:

(员)在西方的文化背景来看,“话语”反映了欧洲宗教改革,启蒙时期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的论述。

(圆)这种“话语”不是单纯的论述,而是和实际的行动结合在一起。

(猿)这种“话语”在行动中可以不断修改和发展,即使毛泽东对形成某种“话语”起了巨大作用,这种“话语”也是不断发展的。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话语”并不是一个贬词,而是在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中非常流行的用语。“话语”通常译作话语,或者话语体系。实际上,思想总是要通过话语来表述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思想为党内所接受,以至成为大家的共识,而产生革命的行动,这种行动导致革命的胜利,这可以说是延安的民主模式的本质。

比较制度分析的用语是“意识形态”,即信念和理念,研究这种信念和理念如何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形成一种制度。而我们研究延安民主模式的用语则是“话语”,根据我们研究的需要,可以称之为

^① 见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页。

某种话语模式,即研究某种新的话语模式如何成为人们的共识,而改变了社会和社会制度。这样,既可以借鉴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优点,又可以适合于研究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并且可以揭示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相互关系,从而对我们当前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有所借鉴。

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我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继续、发展和完善。但是,由于过去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看做同新民主主义不同的阶段,即所谓“要革我们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对借鉴延安的民主模式造成了理论的障碍。中国共产党现在明确,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借鉴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即延安的民主模式扫清了理论的障碍。

当然,我们现在同延安时代有很大的区别。在延安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时期,面临着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重任务。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结成联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国内,国民党采取反共的方针,推行法西斯统治。因此,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共方针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同国际和国内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对延安民主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我们如何继承、借鉴和发展延安的民主模式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书首先介绍延安的民主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限于本书研究的目的,我们只是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模式作了比较,通过话语模式的比较,使我们可以了解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本质。由于国民党采取反共的方针,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理论,从三民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运动